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ZHONGGUO TESE DAGUO WAIJIAO YANJIU

罗建波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ZHONGGUO TESE DAGUO WAIJIAO YANJIU

罗建波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 罗建波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6813 - 4

I . ①中… II . ①罗… III . ①外交—研究—中国—现代 IV .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38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郑成花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
中央党校学科建设专项基金

序一

中国大国外交的时代特色

刘建飞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里讲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是指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对其他大国的战略与政策，也不是指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而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正式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个概念，但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并非近年才有的事物。中国的大国外交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同传统的大国外交相比，中国的大国外交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同时，与世界共同发展、共享和平、互利共赢。

一 不断演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普通国家。古代曾长期是世界人口大国、地理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有时也是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即使是近代遭受西方列强欺负的时候，也仍然是世界人口大国和地理大国。

身为“大国”，自然就有“大国外交”。朝贡体系就是古代中国大国外交的突出特点。乾隆皇帝拒绝与英国通商，尽管体现了他的傲慢、封闭与偏狭，但也反映出其大国情怀。1863 年，尽管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被西方列强打败了两次，同治皇帝在给林肯总统的信

中还这样称道：“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①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虽然清王朝以惨败告终，但中国敢于直面八个西方列强，也隐含着晚清朝廷未将其统治下的中国视为一般的中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未能给中国以“战胜国”待遇，随即引发五四运动及中国人的怒吼，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众仍怀着还未消亡的大国情结。以实现民族解放和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从来未将中国看成一个普通国家，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②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外交一直蕴含着大国外交的“气度”。概括地讲，新中国的大国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这时的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地理大国，还是政治大国。中国“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改变了冷战对抗中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中国敢于出兵朝鲜，直接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兵戎相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大国气魄”。后来构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特别是给予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偿援助，都是大国外交的体现。回过头来看，这一阶段的大国外交，主要依托于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主要着眼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维护国家安全。不过，由于中国的综合实力有限，大国外交的效果也相对有限。虽然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还不够突出，有时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上都显得作为不足，尤其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出现不少失误。

第二阶段为1979—2012年。这一时期，中国不仅仅是人口大

①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②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国、地理大国，或者政治大国，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开始越来越成为大国禀赋的重要方面。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主要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政治上注重韬光养晦，以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注重同世界各国保持良好关系。所以，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相对比较低调，突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太强调“大国外交”。不过，中国的大国情怀依旧，“大国外交”的身影还在。邓小平就强调，“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① 两极格局解体后，推进多极化一直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主张。与此同时，中国也一直主张改革现行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通常都是大国关注的事情。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大国外交是以韬光养晦为前提的大国外交，中国外交更多地着眼于为国内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国际舞台上则是有限度地发挥大国的作用。

第三阶段始于2013年。历经五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遭受重创，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加速。而中国则是新兴国家的代表，崛起势头举世瞩目。伴随着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应提升，世界许多国家期待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承担“大国责任”。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大国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也日益突出。出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顺应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中国外交需要更加有所作为，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展现中国外交的大国精神与大国气度。中共“十八大”之后的领导集体在外交事务中“奋发有为”的一面让世界瞩目，尽管仍然坚守着韬光养晦的精神实质。

当前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传统的大国外交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中国特色体现在哪里？这正为世界所关注。

^①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二 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型大国外交

一个国家的外交首先要为本国利益服务，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在旧时代，西方列强在获取本国利益时，常常以牺牲别国利益甚至世界整体利益为代价。对比之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是：在坚定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时，顺应时代潮流，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贡献力量。

新型大国外交重在推动世界和平。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一直受“和合文化”的浸润。在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赢得民族独立后，中国对和平的期盼格外强烈，对和平的维护格外坚定。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接过历代志士仁人追求国家独立富强、世界大同的伟大事业，更是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以促进世界各国平等相处为愿景。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从奉行不结盟政策到对独立自主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坚持，都体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当前党中央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都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

新型大国外交重在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们有可能借助全球化带来的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利用好外部机遇来推动自身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可能难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而使自己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进而进一步被边缘化，拉大同发达国家的距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更加重视国际事务中的发展问题。中国不仅一如既往地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倡导并践行“正确义利观”，以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而且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为发展中国家争利，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演进。在 2014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在推进多边外交时，要着重“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①。

新型大国关系重在通过合作来促和平、谋发展。中国一直在努力探索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边倒”战略就是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来维护世界和平；后来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意在同世界各国合作，以实现各国间的“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大了同各国在发展上的合作，直接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当前世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核扩散、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中国更是高举合作的旗帜，将之与和平、发展并列，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主题。为了更好地推动中非互利合作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中非关系要体现出“真”“实”“亲”“诚”；为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又提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在更广泛的全球层面，近年来中国更是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更为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与此同时，中国从自身经济发展、改革和转型出发，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能否在合作中与各国实现共赢，成了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将共赢与和平、发展、合作并列，作为中国外交的旗帜和主题，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顺应时代潮流。

新型大国外交重在实现世界的互利共赢。所有国家的外交都是处理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不同的国家在处理这个关系时所秉持的理念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其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在旧时代，列强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为此往往要牺牲他国的利益乃至全世界的利益，结果导致战争频发，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长期

^①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29 日，第 1 版。

贫穷落后。新中国一直秉持要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理念，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 所以在外交上，一直将本国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结合起来，致力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双赢。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反对霸权主义到宣誓永不称霸，从申明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到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都反映了中国要与世界双赢、共赢的精神。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②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更需要坚持中国与世界双赢、共赢的理念，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同时在世界共同发展中进一步发展自己；以自己的贡献促进世界和平，同时在世界总体和平的大环境中营造自己的外部环境；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推动国际合作，同时在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中加强自己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共赢，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中国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4—755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9日，第1版。

序二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大战略布局

马小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鲜明的大国外交登台亮相，可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尽显。国际舞台上，打着鲜明“中国创造”标记的外交与国际公共产品喷涌而出，中国外交更具章法，更有力量，更富于智慧，也更显魅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特色外交战略的轮廓已清晰显现。

一 “东稳，西进，北固，南下”：中国大周边战略蓝图清晰呈现

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之后的一年里，中国外交深耕周边，践行“亲、诚、惠、容”战略大思路，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成果。强调树立“大周边”的战略思路，即不拘泥于贴近中国的诸多邻国这个小周边，更要关注向纵深扩散辐射的战略大周边，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战略关照下，进一步统筹中国大周边东—西两个战略方向的平衡，进而统筹海—陆两个战略方向的平衡，力争形成东西联动、海陆互补的有利战略态势。在稳固北方既得战略利益格局的背景下，关照南部战略利益格局的不断优化，形成以北（俄罗斯）促西（中亚）有利于我的战略大格局，缝合起大西南方向（印巴—南亚）与南部（东盟）的战略缝隙。

“东稳，西进，北固，南下”的中国大周边战略蓝图清晰可见。

观察近年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仍可清晰感受到某种悖论现象：一方面，周边国家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分享发展红利的战略期望不仅未变，反而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应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焦虑感和紧迫感也同时上升，对华心态更趋敏感，疑虑与戒备、防范和牵制增多。同时，近年中国周边此起彼伏的国际热点，几乎无不与历史遗留的中国领土主权争议相关联。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周边国家急于扩展自身利益或提升国际地位，或借美国之力，或彼此合纵连横，形势错综复杂。这些情形，其表层原因依然是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存在着某些不适应，一些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存在疑虑；但就深层原因而言，在亚太战略区域事实上出现了因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与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之间的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

毋庸讳言，中美关系是影响中国东部战略方向最重要的国际因素。近年，中国快速和平崛起使中美之间互为战略合作者与竞争者的关系更趋复杂，双方面临在美国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议题之间，寻求战略平衡的现实问题。从庄园峰会到瀛台散步，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达成共识，并围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核心内涵，开始践行路线图。习奥怀柔会晤期间，中美在信息技术、军事互信、签证互惠安排、气候变化、人文交流等多领域都取得显著进展，这不仅为未来两年合作创造了良好氛围，也将惠及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中美两国间高质量战略沟通机制的运行，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不仅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可靠战略保障，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成熟国际关系机制。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整套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清晰认知对方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从而对对方发展保持比较稳定战略预期的经

验。因此，协调中美战略关系无疑会对两国关系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也为稳定东亚国际秩序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压舱石。

中美关系已成为稳定现有东亚局势的主轴，在此背景下，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在达成四点共识的基础上，APEC 怀柔峰会期间实现了中日首脑会晤，近年来因日方引起的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无端发酵而遭到严重破坏的中日关系，出现缓和稳定趋向。反观安倍政府的外交战略却受此牵制，尽显疲于奔命之态，而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大局中的权重、位次则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中韩关系的发展步入了全面战略合作的新时期，中韩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扩展为实现共同发展，致力地区和平，携手振兴亚洲，促进世界繁荣，不仅积极推动了中韩关系的发展，而且有力地遏制了朝核问题恶化的趋势，有效地发挥了正能量，成为东北亚国际格局的稳定器，成为稳定中国东部战略方向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速发展。2014 年习近平主席再度首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两次来华，中俄元首五次会晤，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拉紧了两国利益融合纽带，保持了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高水平运行。习近平主席专访蒙古国，构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极大推进了中蒙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在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实现了引人注目的中俄蒙三国峰会，达成诸多战略共识和外交成果。中俄蒙三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愿意将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三方愿在捍卫地区安全、推动世界多极化方面携手合作；三国峰会有望实现机制化。这一战略成果，将造成稳固的中—俄—蒙战略掎角之势，使我国北部战略方向的稳定态势得以巩固。

两年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完成了对中亚国家全覆盖的外交出访，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有力地扩展了我国西向战略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而围绕这一战略构想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项目规划的接踵

展开及快速付诸实施的速率，给国际社会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迅速启动，拟议中的上合组织银行、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上合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的签署、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开启，等等，这一切使西部邻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和国家实力，感受到了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带来的实惠，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2014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空间中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一致同意沿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进一步构筑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中印务实合作实现了新突破。习近平主席访问了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建立中马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宣布启动中斯自贸区谈判，启动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有力推进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在南部战略方向上，中国政府积极着手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实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等系列战略构想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商谈中国—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并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地区战略议题，使得东盟国家继续向好调整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中国尊重缅甸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抓住缅甸经济改革之机，适时调整推进了中缅关系发展。因“981钻井平台事件”受到伤害的中越关系及时得到修复回归正轨，越方积极参与了中国主导的诸多亚太经济发展机制安排，双方达成不因南海问题冲击中越关系大局的战略共识；中菲领导人怀柔会晤，显示中菲关系趋于改善；南海问题热度持续降温，正在淡出全球和区域安全视域。

在向南延伸的南太平洋方向，习主席出席第九次G20峰会，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将中澳、中新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访问斐济时，投棋布子，集体会晤了南太平洋小岛国领导人，与南太岛国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了

同南太建交岛国的整体合作。

总体来看，在这广大的中国周边战略区域中，在东部战略局势得以稳定的背景下，北方中俄蒙战略掎角之势得以巩固，西进中亚和西亚，南下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综合考量经济发展、地缘政治、战略通道、能源资源等因素，以能源管线、铁路、公路、航运、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资金、贸易和产业链连接并重，加快推进区域利益共同体建设与战略经营，实现表里相互依存，战略纵深与前沿相互呼应的局面，建构与塑造长期有利于我国的大周边战略环境，东稳、西进、北固、南下的战略形制，遂以乘势。

二 以“走出去”战略为牵引，构筑“一带一路”、两翼齐飞的地缘经济战略框架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最让世界赞叹的大概莫过于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推出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经济发展议程、国际投融资机制倡议。在倡导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中国又与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建立授权资本为1 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缓解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遭遇的“融资难”问题；中国同印度等21个亚洲国家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备忘录，启动授权资本为1 0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基础设施投融资新机制；中国宣布投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在怀柔APEC峰会上，中国提议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得到了APEC成员的支持；中美两国在APEC会议上就中美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寻求共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融合，就中国加入TPP及美国加入RCEP展开讨论；中国采取实质性举措破解基础设施投融资难题，大力推进G20基础设施投资议程；中国与两个重要的亚太国家韩、澳，实质性结束了FTA谈判；中国政府还提出了筹建海上丝绸之路银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的倡导。

这些战略构想和举措的提出与付诸实施，标志着中国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宏大的经济战略布局，也意味着中国将不再仅仅是国际经济体系及规则的参与者，而正在努力成为国际体系的建构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中国明确表示愿意让各国“搭便车”，一方面希望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顾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和亚太伙伴同舟共济、共享发展成果的责任与担当。中国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有意愿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这些区域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旨在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财政瓶颈，即为“一带一路”项目筹措资金，提供财政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将通过公路、铁路、电力、光纤网络，把中国与东亚、南亚以及欧洲的经济体连接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旨在推动东亚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中国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深化它们与中国的生产、贸易和金融联系及外交关系。“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一年来，已经有沿线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一带一路”项目的提出，以及2014年中国第一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情势，表明中国的政策和战略正在发生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即中国正在大踏步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这些战略构想和举措中，以“一带一路”构成基本的战略框架，在“走出去”战略牵引下，实现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优质产能的转移，在装备、技术、管理“走出去”的同时，以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主要投资领域，推进中国资本全球化战略。

“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中国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东快西慢、

海强陆弱的不利格局，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两翼齐飞、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毋庸讳言，这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世界地缘经济—政治格局的重新定位。

三 充分评估国际形势，瞄定战略大趋势的发展方向

近年的国际政治中最抢眼球的事件，莫过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伊斯兰国（IS/ISIS）的横空出世。

乌克兰危机的缘起，是西方利用乌克兰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时机，推动了乌克兰不同族群和政治力量的分裂，核心问题聚焦于欧盟东扩—北约东扩危机，而克里米亚事件的突发则使美国与欧盟始料未及，乌克兰危机内战化、长期化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对抗。乌克兰危机使美/欧盟—俄双方相互改变了彼此的战略认知，互相认为对方试图挑战自己的战略底线，破坏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美欧加强了对俄的战略遏制与威慑，不断加大对俄经济制裁，并利用金融杠杆工具和油价暴跌的形势，使俄罗斯经济遭到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困难，从而迫使俄罗斯进入了战略收缩状态，甚至使美俄及俄—北约之间早已达成的有关限制导弹的条约的执行，也面临考验。

在中东，美国持续了十几年的伊/阿战争，暨全球反恐战争，不仅未能解决大中东地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民族宗教冲突、地缘政治矛盾，反而造就了一个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怪物。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美国既是制造者也是启动者），ISIS 的从天而降搅乱了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战略调整计划，动摇了美国从伊/阿两个战场撤离的战略信心，延宕了美国击毙本·拉登后意欲迅速收拾的反恐战争残局，拖拽了其在全球范围开始实施的战略再平衡计划。有学者认为，ISIS 的异军突起是美国中东战略的严重失误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经历的政治、经济、民族和认同危机相结合的悲剧产物。种种迹象显示，形成百年的中东地区政治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何时以何种形式建成，已成为该地区乃至全球面临的